

文学译介、文学研究与跨文化交流： 许钧与勒克莱齐奥在中国的诗意历险

Literary Translation, Literary Research and Intercultural Exchange: Xu Jun and the Poetic Adventures of Le Clézio in China

袁筱一 (Yuan Xiaoyi)

内容摘要：早在 1983 年，法国当代作家、2008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勒克莱齐奥就借助《沙漠》的中译本开启了他在中国的“诗意历险”。作为勒克莱齐奥在中国最早的译者之一，许钧对勒克莱齐奥的译介、研究构成了一个文学翻译与接受的经典案例。原作者对译者的“呼唤”，译者对原作者的“回应”，双方基于信任与尊重的平等交流，这一切使得著译双方能够在本质为跨文化交流的翻译过程中得以不断相向而行，推进对于彼此、对于彼此所在的文化的深入理解。而伴随着这一过程的，还有译者翻译观的日臻成熟以及著者对于文学新的可能性的不断探索。勒克莱齐奥在中国的诗意历险，也让我们看到了勒克莱齐奥所阐述的世界文学的可能。

关键词：许钧；勒克莱齐奥；文学译介；跨文化交流；世界文学

作者简介：袁筱一，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法语文学与翻译理论。

Title: Literary Translation, Literary Research and Intercultural Exchange: Xu Jun and the Poetic Adventures of Le Clézio in China

Abstract: In 1983, the renowned contemporary French writer and 2008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laureate, Le Clézio, began his “poetic adventure” in China with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his work *Desert*. Xu Jun, one of Le Clézio’s earliest translators in China, has played a pivotal role in introducing and studying Le Clézio’s works, creating a classic case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reception. This dynamic process, characterized by the original author’s “call” and the translator’s “response,” facilitated through equal exchanges grounded in mutual trust and respect, exemplifies the essence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translation. This collaborative endeavor has not only led to a deeper mutual understanding of each other’s cultures but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maturation of the translator’s perspective on translation and the

author's ongoing exploration of new literary possibilities. Le Clézio's poetic adventure in China illuminates the potential of world literature as envisioned by the author.

Keywords: Xu Jun; Le Clézio; Literary Translation; Literary Research; world literature

Author: Yuan Xiaoyi, Ph.D,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The concentration of her study is on French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theory (Email: claire_yuan 73@163.com).

文学翻译的本质与目的性 (finalité), 从来都是翻译理论中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 也颇具有形而上的意味。利科 (Paul Ricoeur) 在他那篇著名的讨论不可译性的“翻译的范式”一文中曾充满诗意地反问道: “如果我们不曾涉足那些令人焦虑的不可言说的疆域 (……) 我们在爱情和友情里的那些最美好的互动, 是否还能保有这种审慎的美德——秘密 / 审慎——让我们得易于近处保持距离呢?” (保罗·利科 96) “于近处保持距离”, 一语破的地道出了 (可以维持的) 爱情或者友情的实质, 也是对于 (可以完成的) 翻译的最好类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 文学翻译开启的往往是一段全新的精神交流和对话, 在某种程度上, 围绕着译作所发生的一切, 其价值往往会“溢出”译作本身, 进入一个更加宏阔的语境。

许钧对于法国当代作家, 2008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勒克莱齐奥 (Jean-Marie Gustave Le Clézio) 的译介、研究就是一个经典的范例, 生动地诠释了文学翻译如何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以“于近处保持距离”的方式实现跨文化交流, 并且在对彼此的理解中不断唤起新的创造。当然这绝非仅是历史的偶然, 事实上, 勒克莱齐奥在中国的译介发生——我们在此采用的是伊格尔顿“发生” (event) 的概念¹——同时也是许钧翻译观的或然产物。早在 2003 年, 许钧就明确地指出, “翻译是以符号转换为手段, 意义再生为任务的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 (许钧, 《翻译论》 75)。我们或许可以说, 著译双方对这场精神交流的期待, 对这场精神交流去向何方的共识以及在交流过程中的彼此丰富是这一语言的历险得以实现的根本前提。

一、原作者的呼唤与译者的选择: 由远及近

倘若我们将翻译看作是阐释循环中的一站, 这一站在某种程度上总是位于原作之后, 这就导致了译作与原作之间通常完成的是跨时空的对话, 因而对话的价值通常也需要被放置在更为广阔的文化史背景中才能得到理解。诚然,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 文化流通的速度也在加快, 译者与著者处在同一个时空之下, 并且能够跨越地理和语言的边界进行主体间对话的可能性逐渐增加,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精神对话仅仅凭借译作的完成或是著译双方的晤面就

1 伊格尔顿认为唤起“异”的感觉的可以被称为“文学事件”, 即文学的“发生” (event)。

能够发生。

这种在两个平等主体之间的精神对话在一方面当然取决于原作的“呼唤”：就像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中指出的那样，取决于作品“从本质上是否接受翻译——亦即与翻译这种形式的涵义相吻合——是否欲求翻译？”（Berman 55）¹虽然勒克莱齐奥是在1983年，因为其《沙漠》的中文版问世才开启了中国之旅，但是早在他写作的初期，勒克莱齐奥就已经做好欣赏差异、拥抱差异的准备。在后来一次和许钧的访谈中，他明确表示，文学让他产生热爱的地方，就在于“借助翻译的工作”，造就“一种生命的经纬”，“逃离单一身份的力量，创造超越于学校、陈词与边界的语言的力量”（许钧 勒克莱齐奥 61）。但是在另一方面，原作呼唤翻译也隐含着另一个问题，即是否“能找到适切的译者”，而这个问题——安托瓦纳·贝尔曼继而写道——则取决于是不是在“一个对的时刻”（*bon moment*）（Berman 56）。

考察勒克莱齐奥与许钧的相逢进而相知的过程，我们似乎就能够理解何为“适切”，何为“对的时刻”。勒克莱齐奥的《沙漠》（《沙漠的女儿》）在1980年获得首届的保罗·莫朗奖，也就受到了我国译者的关注。许钧就是在翻译《沙漠》时和勒克莱齐奥取得了联系，得到了原作者热切的回应。1982年，勒克莱齐奥为《沙漠》中译本写了序言，虽然简短，却显示出非常诚挚的“靠近”愿望。中国读者对他仍然一无所知，而他如此简单描写他的作品：“《沙漠的女儿》讲述的是一个英勇斗争的故事，它描写了一位老人在信仰的激励下，在人民力量的支持下与殖民主义灭绝人性的侵略进行了双方实力不相等的斗争，同时也描写了一位年轻姑娘在当今西方世界与不公正和贫困所进行的力量悬殊的孤立斗争”（钱林森，“永远的行者：勒克莱齐奥与中国” 49）。然而，在《沙漠的女儿》之后，却需要“差不多等了近十年”（钱林森，“永远的行者：勒克莱齐奥与中国” 50），中国读者才再一次读到了更为丰富的勒克莱齐奥。在90年代初期的一波勒克莱齐奥的译介小高潮中，许钧在目的语适切的语境下，主动选择了勒克莱齐奥的处女作《诉讼笔录》。许钧曾经在北京大学人文工作坊的一次演讲中谈及在他翻译生涯的初期，虽然读到了勒克莱齐奥，但是完全不能理解，是在翻译了《沙漠》之后，“又回头去找了《诉讼笔录》，发现以前读不懂的部分渐渐能够理解了。在1991-1992年，我把这本书慢慢地翻译了出来”（许钧，“文学翻译、文化交流与学术研究的互动” 73）。相较于《沙漠》的译介，这次主动的选择则更反映了目的语文学接近出发语文学的愿望。

90年代既是全面译介勒克莱齐奥的开始，同时也是将勒克莱齐奥纳入中国当代法（外）国文学研究视野的开始。柳鸣九主持的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里就收录了勒克莱齐奥的《诉讼笔录》，邀请许钧翻译，并于1992年出版。也是在这一年，勒克莱齐奥来中国，和许钧见面，从此之后开启了一段友谊的

1 该译文译自 Antoine Berman 在书中对《译者的任务》的法文译文。

佳话。在三十余年的时间里，勒克莱齐奥每有新作，都要寄给许钧，而许钧对中国出版界和文学研究界的影响也日益增大，因此在此后的过程中一直主动向中国的出版社推荐翻译勒克莱齐奥的作品，并且让身边的学生和同行一起阅读、翻译和研究勒克莱齐奥。在2008年勒克莱齐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除了《沙漠》和《诉讼笔录》之外，勒克莱齐奥的《少年心事》《战争》《流浪的星星》《金鱼》和《乌拉尼亚》等重要作品都在许钧的有效推动下被翻译过来。柳鸣九为《诉讼笔录》和《少年心事》所作的序，许钧为《战争》所作的序，袁筱一为《流浪的星星》所作的序，都是中国最早的勒克莱齐奥研究文章，为中国读者深入理解勒克莱齐奥以及同时期的法国文学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许钧也是在这段友谊发生的过程中渐渐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翻译研究者和文学研究者，从而渐渐成长为能够与著者“平起平坐”的译者，一个能与勒克莱齐奥平等对话的精神主体。在勒克莱齐奥这一译介案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转折的确发生在90年代以后，并且在勒克莱齐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已经变得非常显见。许钧描述过2004年前后，“有机会推荐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便向瑞典文学院推荐了他，也把我的推荐信寄给了勒克莱齐奥先生，跟他说‘你一定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许钧，“文学翻译、文化交流与学术研究的互动”73）。而2008年1月，许钧推荐翻译、校订的《乌拉尼亚》先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了当年中国的“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勒克莱齐奥获诺奖之后，他受到许钧的邀请，数度来到中国，与中国的作家展开对话，并且受邀成为许钧当时任教的南京大学的客座教授。他在南京大学的同事不仅推动了对他本人作品的研究，他还带领学生去发现法语文学的新领域。毫无疑问的是，中国对勒克莱齐奥的翻译、阅读与研究已经成为勒克莱齐奥作品“来世的生命”，这一生命与其“前世的生命”共存共生、彼此呼应，而不仅仅是其法语作品微弱的余音。

即便对于著者而言，译者往往是离他作品最近的读者之一，这种彼此毫无保留的相向而行却并不总是能够发生。纵观这段友谊的发生与逐渐加深，我们可以发现，成就这样一段“于近处保持距离”的美好关系必须具备三个前提：其一是双方都有彼此接近的愿望，正是这种愿望不仅改变了著者被译的被动状态，也改变了译者“被选中”的被动状态，使得双方的由远及近都成了主动选择的结果；其二是双方虽然并不位于同样的“语言的森林”之中，却能够站在同样的高度，这一点保证了对话的效度与持续性；最后则是双方对于差异秉持相同的立场，著者能够将差异融入自己未来的写作之中，而译者则能够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之上以体现差异为己任。

二、翻译的本质就是互相尊重与自我丰富

一切都是从翻译开始的。

对于勒克莱齐奥来说，历险是双重意义的：即肉身的历险与语言的历险。勒克莱齐奥是一直在路上的人。少年时就有过在毛里求斯、尼日利亚生活的经历。长大后，勒克莱齐奥的足迹也遍布世界，在英国、泰国、墨西哥、毛里求斯、美国和中国都曾经长期居住。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或许语言的历险对于定义勒克莱齐奥的写作则更为重要。语言的历险也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将肉身的经验置于语言之中，再通过语言实现自己的历险想象，获取有别于现实经验的另一种经验。例如在《非洲人》中，他想象自己是个非洲人，“梦想自己的母亲是个黑人”，至于这一梦想的原因，他解释说“从非洲回来之后，我给自己编了一个故事，一段过往，借以逃避现实，因为在这个国家，在这座城市，我谁也不认识，我就是个外国人”（勒克莱齐奥 4）。另一方面，则是将自己的文字无条件地交付给另一种语言，期待翻译家创造新的“奇遇”。在一次访谈中，他诚挚地表达了他对译者的感谢，他说“感谢我作品的所有译者，特别感谢我的好友许钧教授，是他让我发现了深厚的中国文化，并有机会和学生们就跨文化、跨学科的主题进行交流”（高方 施雪莹 2）。这一表达并非完全出于谦逊，而是他对于语言的观念所致。在同一个访谈中，他详细地勾勒了自己语言观的变化，提起在创作初期执迷于语言的形式，甚至基于对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计算语言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了小说《巨人》的创作，在穷尽抽象的词语的使用之后，“经历了一场精神危机”。多亏了巴拿马丛林的生活经历，让他意识到“自己提出的那些问题都是伪命题”，从而渐渐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形式，也渐渐在“向传统的叙事回归”中找到了自己的风格。¹

可以说，勒克莱齐奥对于语言与写作使命的认知决定了他对于翻译所持的开放态度，并且最终反哺到他对于语言与写作使命的认知，让他得以不断“出发”探索新的写作和语言的可能性，从而不断丰富自身的写作。然而我们更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勒克莱齐奥在精神和语言上的重要对话者之一，许钧与勒克莱齐奥交往的三十余年，也是他的翻译观形成和日臻成熟的三十余年。这才是这场平等对话得以发生的根本原因。许钧的翻译研究也为勒克莱齐奥的文学译介、文学研究和跨文化交流活动带来了新的视野，让他能够带着翻译的“新问题”，重新思考文学译介、文学研究在“没有明确的边界，也没有精确的起点和终点”（塞缪尔·亨廷顿 28）的文明互鉴中能够起到的作用。反过来，他的文学译介、文学研究以及所参与的文学（文化）交往为他的翻译研究不断提出新的问题，让他的翻译研究早就超越了从文本到文本的层面，也让他完成了从翻译文化观到文化翻译观的飞跃。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勒克莱齐奥作品的翻译、与勒克莱齐奥的交往、将勒克莱齐奥的作品和思考引入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语境之中，这一切不仅成为理想译介与接受的范本，更

1 参见 高方、施雪莹：“文学的守常与流变——访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2023）：4。

是进入良性循环的中外跨文化交流的范本。

我们不妨简单地回顾一下在和勒克莱齐奥交往的三十多年的时间里许钧翻译观的发展与变化。作为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第一代学者，许钧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经借鉴中西方翻译理论领域的思考，较为清晰地表达了翻译需要尊重原作风格的观点。尤其是在当时看来颇有些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关于风格再现”一文中，他提出“一个称职的译者，应辨别原作者特殊的艺术个性，原作特殊的风格，尽量排除自己的艺术个性与风格”（许钧，“关于风格再现”61）。这一原则也很好地在他对勒克莱齐奥早期作品的翻译中得到了贯彻。他曾经谈到1977年初读勒克莱齐奥时的“读不懂”。但恰恰是对于“读不懂”的“忘不了”¹让他在自己的翻译生涯之初就选择了勒克莱齐奥的作品，正是出于许钧对翻译本质的基本理解：即差异并不是拒绝翻译的理由，相反差异与非同时性正是翻译欲望产生的出发点。

90年代中期，翻译理论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外语学界热议的问题。许钧敏锐地捕捉到了名著复译的现象，组织了《红与黑》的汉译讨论，将“如何译”与“为何译”的问题联系了起来，认为“切不能忽视或轻视‘文字’与‘文化’的关系，不能将‘文字’、‘文学’与‘文化’完全割裂开来”（许钧，“文字·文学·文化”168），已然将翻译的问题放置在跨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之下。我们当然相信，许钧在理论研究中已然确立的翻译文化观与勒克莱齐奥能够进一步走入中国读者和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从而真正开始他在中国的“诗意历险”密不可分。因为在这个时期的许钧看来，勒克莱齐奥的作品之所以会“呼唤”翻译，是因为它固然是文学的，却更是20世纪后半叶法国文化和思想的，反映了法国文学基于自身传统的反思与多样性。

随着新世纪的来临，许钧更是进一步强调了翻译的“目的性”——而不是目——决定了翻译的本质，认为“为了交流有了翻译，翻译促进了交流。翻译这一基本的跨文化交流活动的本质要求，翻译要以促进交流为己任”（许钧，“尊重、交流与沟通”86）。此后，他更是明确地表述了翻译与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将翻译的作用与价值提升到“加强世界和平文化建设”的高度。²在许钧的推动下，翻译勒克莱齐奥必然也是为了达成“促进文化交流”这一终极的目的性。在现实条件的许可下，于是转化为出发语和目的语的翻译家、作家、学者、出版社之间面对面的交流，推动所有的文化交流主体对他者文学和文化的阅读与理解。在勒克莱齐奥的案例上，或许还要加上作为老师的勒克莱齐奥与学生的交流。而在许钧的推动下，这一交流无疑已经碰撞出了新的火花，获取了跨文化传承的历史维度。

基于翻译实践，并且在翻译与跨文化交流的实践中提炼理论问题，推动

1 参见许钧：“文学翻译、文化交流与学术研究的互动——以我和勒克莱齐奥的交往为例”，《外语教学》3（2018）：73。

2 参见许钧：“文化的多样性与翻译的使命”，《中国翻译》1（2005）：44。

理论思考，不断揭示翻译最为本质的方方面面，这既可以用来概括许钧从翻译家到翻译思想家的学术历程，也可以概括翻译这个阐释循环的价值所在。从文本到现象，从文字到文化，从“如何译”到“为何译”，从结果到过程，虽然译者与著者是从不同的路径，完成的是不同意义的文本和不同层面的跨文化交流，但好的翻译的发生，无疑都是达成心灵上的契合之后，不断丰富自我的过程。于许钧而言，是在翻译包括勒克莱齐奥在内的法国作者——同时代的，或者不同时代的——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完善自身的翻译观的过程；于勒克莱齐奥而言，同样是一个通过被翻译成新的语言，通过被新的语言的读者阅读和思考，不断地发现法语文学潜在的可能性，不断丰富自己的写作形式与内容的过程。于是，贝尔曼所谓的原作者与译者的“同时代性”（*contemporanéité*）的问题在他们的努力之中迎刃而解。一方面，作者的近距离存在并没有在他的作品之上“造成阴影”¹；而另一方面，译者也因为克制，因为对原作和原作者的尊重，因为对于翻译“任务”的清醒认识赢得了原作者的信任和尊重。

三、诗意的诱惑与再诱惑：世界文学的“理想”生成范式

译文进入不同的接受环境，在另一种语言里得到理解，从来都是前途未卜的历险，因而，无论是作为译者，还是作为研究者，阐释者的立场、观点和角度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正因为译者往往是在目的语的语言中离作者最近的那个人，也往往是最先通过各种方式——译文正文、序言等译文副文本或是散见在报刊杂志上的各类文章——向尚未“遇到”原作者的译文读者介绍原作者及原作者作品的人。随着译者对于原作者的翻译、了解的全面和深入，他对原作品的理解往往更为全面，阐释的角度也往往会随之更为多元。

在许钧对于勒克莱齐奥的翻译与研究中，我们也能够清晰地看到这一变化。有趣的是，许钧虽然是勒克莱齐奥最早的译者之一，在其翻译勒克莱齐奥的初期却甚少涉入对勒克莱齐奥的介绍。或许是条件所限，还未能深入勒克莱齐奥作品、未能感受到原作者迫切“召唤”的时候，不愿意随意地将“自身的文化传统赋予原文文本”（韦努蒂 204）。而在1984年，《沙漠》的另一位译者钱林森曾经在《沙漠》译序的基础上，撰写过一篇题为“美和刺的统一——读法国当代小说”，这也是最早期的关于勒克莱齐奥研究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钱林森着重指出的是“法国现实主义文学有着批判的传统，它是以批判揭露资产阶级生活为中心内容和主要特征的，作者往往并不致力于对生活中美的发掘，而注重于对丑恶现象的暴露，这就使得这种现实主义文学一般都具有否定的特点”（钱林森，“美和刺的统一” 70）。对不公正的抗争，这诚然是勒克莱齐奥写作最为重要的一个维度，也是最显见的，与现

1 参见 Berman, A. *L'âge de la traduction «La tâche du traducteur» de Walter Benjamin un commentaire (textes établis par Isabelle Berman)*, Paris :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Vincennes, 2007, 81.

实密切关联的维度，但还远远不是其作品价值的全部。此后，在《战争》的序言中，许钧用同样富有“诗意”的笔调，指出了勒克莱齐奥对于现代文明的质疑，并且提醒读者注意作者“摒弃了一切传统小说的构件”，“一切都在于词”，证明了恰恰是词在“扼杀思想，挑起战争”。¹而在2008年《战争》的再版前言中，许钧则已经在对勒克莱齐奥较为丰富的译介基础上，同时也是在对勒克莱齐奥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之后，揭示出勒克莱齐奥在三个层面上的重要价值：一是继承了“人文主义传统”，“以理解为基点”，感受“弱小的生命和社会边缘的人”，“去理解他们，揭示他们的命运”；二是“对现代文明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强烈的批判”；三是以“清醒的意识，关注他者，关注失落的文明”。²在这一再版前言中，许钧尤其强调勒克莱齐奥的写作是“清醒”的，换言之，也就是尤其强调勒克莱齐奥作品在现代社会中的理性价值。

的确，在勒克莱齐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也就是说，在对勒克莱齐奥的译介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中国才真正进入了对于勒克莱齐奥的研究阶段。许钧仍然是这波研究高潮中的主导力量。在2009年到2021年的十余年中，许钧在文学研究期刊上发表了近20篇关于勒克莱齐奥的文章。其中既有与勒克莱齐奥在中国各种活动中的对谈实录，也有围绕着勒克莱齐奥的作品，与其他文学研究者的对谈，但更重要的，是对于勒克莱齐奥作品的“细读”研究。这些形式各异的研究涉及到勒克莱齐奥的创作历程、创作理念、创作主题、创作形式与创作风格，既有勒克莱齐奥本人的思考，也有包括许钧在内的中国法语文学研究者基于作品的独特视角，彼此之间互为佐证，互相推动。在与勒克莱齐奥的几次对谈中，许钧作为一个引导者，分别就写作中的历史与真实、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虚构的起点与想象、文学的价值与文学的形式等一系列的问题与勒克莱齐奥展开深入的探讨，唤起作者对自身作品的再认识。而在研究文章中同样如此，许钧总是深入勒克莱齐奥的一部或者多部作品，同样从一个语言历险者的“经验”——即海德格尔所谓的“经由生命而生”——出发，对上述的所有问题进行再思考。在与勒克莱齐奥的对话中，许钧总是致力于引发勒克莱齐奥呈现更多“异”的因素，或者对“异”的因素进行阐释和再创造。而在研究文章中，许钧则更偏向于与现时的，中国的接受语境关联，揭示出这些“异”的因素在中国当下的意义。

我们不难发现，在系列的对话和研究文章中，有两个关键词是反复出现的，那就是“诗意”（或“诗学”的，对应的是法语的形容词 *poétique*）与“历险”（*aventure*）。在勒克莱齐奥获奖后不久，许钧在巴黎与勒克莱齐奥有过一次对话，几乎都围绕着勒克莱齐奥不同时期的作品展开。勒克莱齐奥对瑞

1 参见许钧：“译序”，《战争》，勒克莱齐奥著，李焰明、袁筱一译，许钧校，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6页。

2 参见许钧：“我和勒克莱齐奥——再版前言”，《战争》，勒克莱齐奥著，李焰明、袁筱一译，许钧校，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5-6页。

典文学院颁奖词里的“文明之上”与“文明之下”的“历险”做出了一定的解释，而许钧也提到他与同样关注过“文明之上”与“文明之下”的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关联，点出斯特劳斯更是居于“思想”层面，而勒克莱齐奥则居于“诗学”层面¹。在2016年的一次访谈中，勒克莱齐奥则完整地回应和勾勒了他作为“历险”的写作，许钧于是将这种由“词语和其中包含的感性”引导下的写作历险定义为“诗意的历险”，两个对谈者于是一起思考作为语言实践的写作与找到“自己的语言”的辩证关系。²此后，在2019年，许钧在“诗意诱惑与诗意生成——试论勒克莱齐奥的诗学历险”一文中系统地阐述了勒克莱齐奥笔下的“诗意历险”：在他看来，“诗意”是与作为存在方式的语言紧密相连的，是通过对“语言原生力量的探寻”创造在世经验，是基于语言之“真”，相信在人类的种种困境中语言所保留下来的希望之光，是赋予在世以一种深刻的人文关怀。³勒克莱齐奥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通过阅读与写作的实践，不断返回语言最本真的状态，行走在奔向本雅明所谓“纯语言”的道路上。

这难道不是最为“理想”的一种世界文学的范式吗？借助翻译家的工作，勒克莱齐奥读到、并且试图理解来自不同语言的文学。它们带有各自文化的传统，对勒克莱齐奥产生了种种的诱惑和冲动，让他想要将这些文字所承载的思想和诗意变为自己的思想和诗意。他幸运地找到了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表达方式，凭借自己的独特性诱惑着不同语言的译者和读者。他甚至幸运地在一些语言中寻觅到了许钧这样的对话者，他们共同构筑起的跨文化交流的种种平台又让不同的文学乃至文化之间加深了正向的，主动的理解。这种交流跨越了空间，同样能够跨越时间。2020年，勒克莱齐奥这一“诗意生成”再一次走向了高潮。他出版了一部关于唐诗的随笔。在《序言》中，他再次在中国的唐诗中找到了他一生致力于寻找的“大自然的语言”。他说，“唐诗中蕴含着深刻人性。它产生于对未来的未知和不确定之中（……）尽管在我们之间相隔了巨大的时间鸿沟，然而，在阅读过程中，我们感到同那个时代的诗人和艺术家是那么的近。我们能理解他们，那个时代与我们的时代是如此的相似”（勒克莱齐奥 董强 4）。

我们注意到，早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的勒克莱齐奥就和其他来自不同地区的法语作家一起，签署了《为了一种世界文学》的宣言。在宣言中，勒克莱齐奥和其他作家借助“复数的法语文学”这一事实，对于世界文学的“主流文学”假说提出了质疑，号称如果世界文学的中心还存在，“这个中心从

1 参见许钧：“勒克莱齐奥的文学创作与思想追踪——访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外国文学研究》2（2009）：1-8。

2 参见许钧：“存在、写作与创造——勒克莱齐奥访谈录”，《文艺研究》6（2016）：73-81。

3 参见许钧：“诗意诱惑与诗意生成——试论勒克莱齐奥的诗学历险”，《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5（2016）：12-25。

今而后是在世界各地”（袁筱一 187）。

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将世界文学理解为翻译文学，认为至少是“从读者的角度看，所谓世界文学与其说是原文作者创作出来的作品，还不如说是翻译过来的作品——这些译本将外文文本翻译为读者所处的某一个具体群体所使用的语言，通常是标准地方语或者多语状况下的主流语言”，因此，“没有翻译，世界文学就无法进行概念界定”。¹许钧始终坚持，翻译的价值就在于“人类语言、文化与社会发展中的一种建构性力量”（刘云虹 许钧 57-58），倡导译者应当自觉地以此为使命。我们看到，正是在这一理念之下，许钧对于勒克莱齐奥的译介、研究，他与勒克莱齐奥之间的相互影响构成了不断变动之中的世界文学的“理想”范式。它虽然不可能发生在所有的原作者与译者之间，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未来的世界文学可期待的前景。译者的任务当然不仅止于得到一个翻译的文本，以取悦自己或者目的语的读者，他应该有更大的野心，以其特有的，生产性的创造抵抗这个世界所有不公正的，语言的或者文化的控制。译者的任务，应该就像乔治·斯坦纳所说的一样，在于“竭尽所能地进行彻底解读”，“在我们的感触把握对象，同时又维护、促进了该对象自主的生命时”，进入“一个‘原创重复’的过程”（乔治·斯坦纳 30）。在许钧的翻译实践和跨文化实践中，则更进一步地显现为一个诗意生成的过程。

Works Cited

- Berman, A. *L'âge de la traduction. «La tâche du traducteur» de Walter Benjamin: un commentaire (textes établis par Isabelle Berman)*. Paris :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Vincennes, 2007.
- 高方、施雪莹：“文学的守常与流变——访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2023）：1-13。
- [Gao Fang and Shi Xueying. “Understanding Literature from both Conventional and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s: An Interview with Nobel Laureate Jean-Marie Gustave Le Clézio.” *Journal of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 (2023): 1-13.]
-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7年。
- [Huntington, Samuel.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translated by Zhou Qi et al. Beijing: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2017.]
- 勒克莱齐奥：《非洲人》，袁筱一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
- [Le Clézio, J.M.G. *L'Africain*, translated by Yuan Xiaoyi.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2.]
- 勒克莱齐奥、董强：《唐诗之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

1 参见劳伦斯·韦努蒂：“翻译研究与世界文学”，《世界文学理论读本》，大卫·达姆罗什、刘洪涛、尹星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03-211页。

[Le Clézio, J.M.G and Dong Qiang. *Le flot de la poésie continuera de couler*.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21.]

刘云虹、许钧：“翻译的定位与翻译价值的把握——关于翻译价值的对谈”，《中国翻译》6（2017）：54-61。

[Liu Yunhong and Xu Jun. “The Positioning of Translation and the Grasp of Translation Value—A Dialogue on the Value of Translation.”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6 (2017): 54-61.]

钱林森：“永远的行者：勒克莱齐奥与中国”，《反叛、历险与超越——勒克莱齐奥在中国的理解与阐释》，高方、许钧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6-64页。

[Qian Linsen. “The Eternal Traveler: Le Clezio and China.” *Rebellion, Adventure and Transcendence: Le Clézio in China*, edited by Gao Fang and Xu Jun. Nanjing: Nanjing UP, 2013. 46-64.]

——：“美与刺的统一——读法国当代小说《沙漠的女儿》”，《外国文学研究》1（1984）：70-72。

[Qian Linsen. “The Unity of Beauty and Thorn - Reading the Contemporary French Novel *Le désert*.”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 (1984): 70-72.]

保罗·利科：《保罗·利科论翻译》，章文、孙凯译。北京：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

[Ricoeur, Paul, *Sur la traduction*, translated by Zhang Wen and Sun Kai.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22.]

乔治·斯坦纳：《巴别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孟醒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

[Steiner, George.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translated by Meng Xing. Hangzhou: Zhejiang UP, 2020.]

劳伦斯·韦努蒂：“翻译研究与世界文学”，《世界文学理论读本》，大卫·达姆罗什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Venuti, Laurenc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World Literature.” *Theories of World Literature. A Reader*, edited by David Damrosch, et al. Beijing: Peking UP, 2013.]

许钧：“存在、写作与创造——勒克莱齐奥访谈录”，《文艺研究》6（2016）：73-81。

[Xu Jun. “Being, Writing and Creating-An Interview with Le Clézio.” *Literature & Art Studies* 6 (2016): 73-81.]

——：“勒克莱齐奥的文学创作与思想追踪——访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外国文学研究》，2（2009）：1-8。

[— . “Le Clézio’s Literary Creation and Tracing of Ideas: An Interview with Le Clezio, Nobel Laureate in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2 (2009): 1-8.]

——：“文学翻译、文化交流与学术研究的互动——以我和勒克莱齐奥的交往为例”，《外语教学》3（2018）：71-77。

[— . “The Interaction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Cultural Exchange and Scholarship: An Example of My contact with Le Clézio.”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3 (2018): 71-77.]

——：“文字·文学·文化——关于‘文字翻译’与‘文学翻译’”，《南京大学学报》1（1996）：168-172。

[—, “On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Literary Translation’.” *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 (1996): 168-172.

——: “关于风格再现——傅雷先生译文风格得失谈”，《外语研究》2（1986）：57-61。

[—, “On Style Reproduction: Mr. Fu Lei’s Translation Style Gains and Losses.” *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 2 (1986): 57-61.]

许钧：《翻译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

[Xu Jun. *On Translation*. Wuhan: Hubei Education Press, 2006.]

——: “尊重、交流与沟通——多元文化语境下的翻译”，《中国比较文学》3（2001）：80-90。

[—, “Respect, Exchange and Communication-Translation in a Multicultural Contex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3 (2001): 80-90.]

许钧、勒克莱齐奥：“文学的精神引导与开放的写作世界——勒克莱齐奥访谈录”，《西北工业大学学报》4（2020）：60-66。

[Xu Jun and Le Clézio. “Spiritual Guidance of Literature and the Open World of Writing: An Interview with Le Clézio.” *Journal of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4 (2020): 60-66.]

袁筱一：“非洲法语文学与世界文学体系的变化”，《外国文学评论》3（2023）：179-192。

[Yuan Xiaoyi. “Francophone African Literature and the Changing Systems of World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3 (2023): 179-192.]